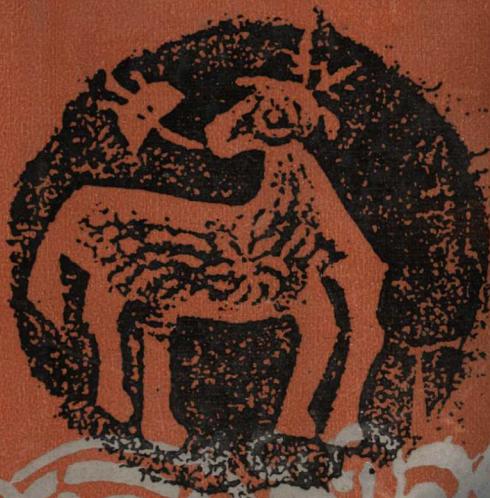


敬亭類稿



[清] 蕭穆 撰

項純文 點校

敬
學
類
稿

〔清〕蕭穆撰

頌說文

卷四



黃山書社

叢書常務編輯・諸偉奇
責任編輯・彭君華
裝幀設計・蔣萬景

安徽古籍叢書

敬孚類叢

(清)蕭 穆 撰 項純文 點校 吳孟復 審訂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辦公室編

黃山書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283 號)

新華書店經銷 安徽新華印刷二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9.875 字數: 41,5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ISBN7—80535—3956/G·146 定價: 10.50圓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

顧問	張愷帆	•	丁繼哲	王惠鵬	光仁洪	杜維佑	李天敏	李廣濤	胡坦	胡雲龍
委員	吳孟復		金隆德	祖保泉	鹿世金	賈文昭	黎洪	劉景龍		
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陶有法		蔡德麟							
副理事長	丁繼哲		杜維佑	胡坦	潘鍔鐘					
秘書長	朱揚		汪慎琳							
理事	田照臨	李庭榮	李炳忠	吳存心	汪石滿	沈基政	馬素英	孫智林	陳昌茂	
	陶顯斌	張其果	張金環	張振明	張繼忠	萬洪翹	紐漣	鄭英保	潘培咸	
主任委員	吳孟復		吳小如	吳作人	吳組綱	周一良	周紹良	金克木	宛敏灝	
副主任委員	金隆德	施培毅	祖保泉	賈文昭						
委員	朱一清	朱世力	汪福潤	沙宗復	徐凌雲	殷呈祥	孫文光	梁垣祥		
	傅玉璋	劉學鋒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學術顧問	王子野	吳小如	吳作人	吳組綱	周一良	周紹良	金克木	宛敏灝
胡道靜		殷煥先	張涤華	舒蕪	蔣元卿			
主任委員	吳孟復							
副主任委員	金隆德	施培毅	祖保泉	賈文昭				
委員	朱一清	朱世力	汪福潤	沙宗復	徐凌雲	殷呈祥	孫文光	梁垣祥
	傅玉璋	劉學鋒						

• 以下按姓氏筆畫排列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偉大祖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都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賈池先哲遺書、南陵叢書諸刻。

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印，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印安徽古籍叢書。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地域，以現行省區為准。時間，一般以成書於「五四」之前為限。內容，以文、史、哲為主。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或註釋，尤注意於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註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兩漢著作及文字、訓詁之書，皆用繁體字，其餘則多用簡體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七月

徐騎省集校本後序

徐騎省集世間無通行本數年前乃得舊鈔
本讀之大抵以沖融雅淡為宗為雖續組織之字
者弗尚也余性不甚嗜古今駢儻之文而獨有取于
此譬言如絕代佳人天生麗質不假鑑妝玉顏獨占
足辟易羣美集中諸廟碑銘及神道碑銘諸
大篇尤精極才力鎔鑄偉詞氣魄沈雄於王錫
盧駒之外別樹一幟又非抽黃對白家所能疎其
什也惟以集不新既不得見近代各家流傳鈔
本每多謬脫至有不可讀者余故不憚博訪舊

管氏有三歸說

余幼讀論語管氏有三歸朱註臺名事見說苑即疑三歸為臺何不儉之旨意說苑著有所謂以此書一時無由得觀默識于心而已稍長讀何晏傳集解數國策韓非子晏子春秋漢諸書有載三歸之事者詳其文義均無有作臺名者東周國策曰宋君奪民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焉可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

前　　言

項純文

敬孚類稿十六卷，爲文二百四十三篇；新增集外文七十八篇、詩二首，編爲補遺，分三卷。爲近代以目錄校讎著名的大學問家蕭穆所撰。

蕭穆，字敬孚（或作敬甫、敬父），桐城人。生於清道光十五年（一八三四），卒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終身只是一個秀才，連舉人也未考上，更沒有做過官。他的精力，沒有耗費在八股時文上，也沒有耗費在詩詞古文上，更沒有耗費在心性空談上。他自幼好學，長而抄、校書，以全部精力用在讀書、校書與搜輯明清史料亦即「網羅文献」上。他三十歲左右，見到曾國藩。曾國藩稱之爲「今之讀書種子」。曾國藩接觸名流學者如許之多，而獨稱蕭穆爲「書種」，則蕭穆之博聞強記冠絕一世，已可想而知。

當時，許多老學者如汪士鐸、錢泰吉、何紹基、莫友芝等，皆曾作客於曾國藩處；桐城的方宗

前　　言

誠也在幕中。蕭穆未嘗入於曾氏之幕，但卻因方宗誠而遍識曾氏幕中諸老。這些老輩不僅學有專精，而且見聞廣博。蕭穆從他們那裏學到了讀書門徑、治學方法，見到了許多人間稀見之書，聽到許多未曾見於文字紀載或與文字紀載有出入的史料，亦即所謂「朝章國故」或掌故之學。清史稿文苑傳說：「蕭穆以攷據稱，博綜羣書，喜談掌故」，略得其實。

中年以後，蕭穆就一直在上海廣方言館，爲該館編譯的新書在文字上進行潤飾。當時譯書這種工作不多，潤色也不費力；蕭穆又無狗馬聲色之好，更不肯犇競鑽營，他仍把全部精力用在訪書、讀書、校書上。他節衣省食，用以購書，得書將近二萬卷，又以之與其他學者互借抄校。彼時南北學者從汪何到張文虎、王先謙、黎庶昌、劉熙載、孫詒讓、傅以禮、袁昶、江標以至繆荃孫、傅增湘、劉世珩、徐乃昌、陳衍、姚永樸，皆與他商量學問，交流奇書與異聞，因之見聞益廣，造詣益高。姚永樸在傳中說：

「先生壹意觀摩古籍，與後生言，於字句異同、刊本良否以及前聞軼事，歷歷如數家中物……在上海凡數十年，四方賢公卿，下逮遊客，語及見聞洽熟，必曰『蕭君』。先生既篤意文獻，見有力者必誘之刊書，所刊數十種，皆躬爲校讎，不取酬。」

陳衍在其所撰傳中又說：

「一寒士續書至數萬卷，間多善本。長沙王先謙任江蘇學政，刊皇清經解續編，又續姚氏補古文辭彙纂，取材出於穆者十八九。……爲文長於致證，敘跋居多。楷書粗拙，得秘本校勘

遂寫，夜靜目昏不少休。……所刊若羅願鄂州小集、徐鉉騎省集，皆札記精詳。未有刻本者其餘則以屬大通李氏、貴池劉氏。與祥符周星詒、大興傅以禮、瑞安孫詒讓交久而摯。詒讓刻札遂、周書、繫補，皆穆任校讎。」

他如袁昶之刻漸西村舍叢書，黎庶昌之刻古逸叢書，滁州李氏之刻古文辭類纂，亦皆資蕭穆之力，有的即全出於蕭穆之手。蕭穆爲作校勘記，既不取酬，亦不署己名；甚且典質已藏善本，得款以付工價。他以廓然大公之心，惟以中華文化與鄉裏文獻爲重，做了而不自表揚的事很多，他所校刻的書，我們還不盡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清末諸家所刻善本，多半曾得蕭穆幫助。他在文化史上的貢獻與在學術史上的成就，也就由此可見。

陳衍評論說：

「目錄校勘之學，有清爲極盛。（蕭）穆蓋何焯、盧文弨、黃丕烈、顧廣圻之流亞也。」

目錄校勘之學，既莫盛於清；在清代，又莫盛於盧顧，而蕭穆能與之爲「流亞」，則穆之學術成就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但這還只是蕭穆學問的一個方面；他還有博聞廣識，熟於掌故的一面，而且，他雖不以古文名，而「爲文氣力醇厚，博辨馳騁」，「淵博泛濫，不爲空虛無補之言」，（桐城文學淵源攷）也是非常可貴的。

二

蕭穆的學問很博，文境很高，但校書以外，主要著作只有敬孚類稿。據桐城文學撰述攷載有雜抄、日記、評點歷代詩約選、尺牘、集外文、續碑傳集、增輯桐城藝文志、桐城文徵（此書二百六十四卷，約二百三十餘家）、桐城文約選（二十六卷，約五十七家），桐城文徵傳及句容縣志。續碑傳集、句容縣志乃代他人編撰，其書尚傳。桐城文徵等不知流落何處。雜抄、尺牘原件尚存於安徽省博物館，其中有已收入類稿者，其餘尚待整理。敬孚類稿是蕭穆主要著作，是他一生心血所凝聚者。其內容十分豐富，而文章亦有佳者。茲分述如下：

第一，卷二、卷三及卷五至卷七，即一些序跋之文，未刊稿中亦甚多。正如當時學者李鴻裔所云：

「諸作皆積學有得之言，而校勘攷訂諸篇尤為擅長，有康、雍、乾、嘉先哲風氣，何義門（焯）、顧潤齋（廣圻）、孔彝軒（廣森）、黃蕘圃（丕烈）而後，斯為嗣音。」（敬孚類稿李鴻裔題詞）

這中間還可以分為三方面：

甲、是校勘成果的錄。這當只是他成千上萬校勘成果中的一、二，但其中頗有發人深省者。如王勃滕王閣序是人們常讀的古文之一，舊時讀私塾的人幾乎人人讀過，現在「古典文學作品選」、「古代漢語·文選」中還常選它。但俗本題目就錯了；第一句「南昌故郡」原作「豫章故郡」；還有「時維九月，序屬三秋」，「九月」也應是「九日」之誤，否則上下合掌。我們每一個稍微涉獵過古書古文

的人，對於這些，自會感到興趣。

乙、這些序跋之文，不僅是爲我們列舉出一些校勘成果，更重要的，是給我們的讀書、校書，提示出門徑、方法，特別是其中一些帶有規律性的結論。如云：

「校勘之家，遇不可解者，往往好以己意，直改本文，遷就己意。豈無千慮之一得？然天下之書，不能盡讀；即讀亦不能盡記。有昔人引用故事，今人不知其所本，輒以俗本習見者直改之，不訛而以爲訛，非是而以爲是，前誣古人，後誣來學，此亦昔人所論藏書之厄也。」

又說：

「務守古人闕疑之義，採諸本之精華，存諸本之同異，但期不失古書之真面目而已。」

這是把孔廣森、盧文弨、黃丕烈、顧千里等人的實踐，總結成了理論。但他並沒有停留在這一步，他又指出：

也有「訛字諸本皆同，萬不能從者，不得不據所本以正之；亦有各本皆同，萬不能改者，亦不得不援所本以存之。」

這就比盧顧諸家更進一層，而與方苞、姚鼐、戴震、段玉裁的校書相似。這種理論性的抽繩、概括，正是這種學問成爲科學學科的標志。

蕭穆這部類稿不僅在目錄校讎方面提出了許多規律性的見解，並作了論證與闡述，而且在史志方面，在文學方面，也有許多提要鈞玄、言近旨遠的論述，足以啓人神思，耐人尋味。書中屢見，此不贅述。

丙、對一些名著、善本(古本、名家批校本)的評介。如書中說到何子貞(紹基輯有高宗政要，陶澍撰有蜀輶日記，汪士鐸撰有胡文忠公撫鄂記等)，皆名家之作，為重要史料，而迄今尚未行世(據鄧之誠云，胡文忠公撫鄂記稿本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不知今尚存否)，蕭穆所言，為後來訪書者提出了線索。目錄學作用不僅在於「簿錄甲乙」，分別存佚而已，還要「攷鏡源流，平章學術」。此書中，有對清代校勘學中一樁公案即水經註校勘中的趙戴是非的評判。乾隆中葉趙一清、戴震同時治水經註，趙書先成而晚出，戴書晚成而先出。趙書未刻之前，已被採進四庫館，而戴震曾在四庫館，於是發生了戴震是否先睹預竊趙著的問題，攻之者、辯之者議論紛紜。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蕭穆借孫星衍校水經註，歸錄副本，作記孫淵如先生水經註手校本云：「近人有見戴氏校本多與趙氏相同，以為戴氏竊趙氏之本成之。其實趙戴二公同時從事於此，戴氏書成較趙氏稍後，兩公意見時有相同，即孫先生『閉門合轍』之說也。」持論公允。又如跋孫莘老春秋經解一文，辨王安石未嘗以春秋為「斷爛朝報」，所言信而有徵，足解千載之惑。又對元和惠氏舊藏北監本漢書書前的惠棟自記「余家世通漢學」(按惠周、楊子士奇、孫棟三世傳經，世稱「吳派」)，嘗謂：亂左傳者杜預；亂漢書者顏籀。故左傳扶賈(達)、服虔，漢書宗古註作評，指出「此等論說，皆好為大言，好為僻論。幸其所言未踐，使其用畢生之力，能為兩書古註，世界能羣廢杜顏兩家之書而行惠氏之書乎？」其書錢辛楣跋方望溪文後，亦用事實反駁了錢氏對方苞文的譏評，皆持之有故，信而有徵，使讀者由衷信服。蕭穆對漢學家的悍然武斷既有諍議，對宋學家的「空談心性」也不以為然，「近

世儒者……掇元明以來語錄，而實無當於身體力行」，他不持門戶之見，纔真是實事求是。在此書中，關於學術源流、諸家得失、蕭穆還有不少深刻的分析與精湛的論斷，值得治學者探索與借鑑。

第二，除了目錄校讎學外，書中還有許多內容是關於「方志學」的。蕭穆在修志方面，有過幾次實踐，並對當時的一些名志做了比較分析，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見解。如記廣西通志謝中丞啓昆所修本一文，介紹了此志體例；對章學誠所撰和州志、亳州志、永清縣志及湖北通志稿作了評介，指出前三志「因地立法，變動不拘，各有精義」，而湖北通志「全編條理峻整，體大思精」，「此志若成，似又在阮元、謝啟昆兩廣通志之上。」（校刊湖北通志稿存稿序）蕭穆論方志，既從理論上闡明方志應有之體例，又考慮到各地的具體情況，斟酌變通。如其作讀宿松縣志附記及記乾隆亳州志等文，指出：藝文志本來只應載邑人著述之書名、卷數，但「有關經世史事實用，而外間概未之見」者，亦不妨「載之」；而亳州志「藝文」一門，「載本州人文及外間名人有關本州諸文」，「蓋因本州人專著無多，不能成卷故也」，意謂此法亦有可取。

蕭穆在方志纂述中，尤重於圖。他在與吳汝綸書中曾提到這點。在跋劉寶楠應圖經時，又闡明古人所作圖經之本義，強調「圖經乃一方之文獻，為後來史家所取裁，年代愈近，聞見較確而且廣」，這種注重當代史料的見解，至今已為人們所共同接受。但從當時來看，彼時洪亮吉一派即以考古為主，這對於那一派學者無疑是一劑良藥。

第三，卷八、卷九及卷十至卷十六諸卷等，即書記、傳、表、記事、雜記等類之文，皆有關於朝章

國故與學術淵源；在未刊稿中此類亦頗多。這一類文章的價值是顯而易明的，約而言之，亦有三點：

甲、對於明清兩代一些歷史問題，提供了一些重要資料。首先是關於清代文字獄方面，如湖州「莊氏史案」、「桐城方、戴兩家書案」、「桐城孫學顏序晚村文集案」等等，這裏都搜羅了一些原始資料，如趙申喬題參戴名世的原疏；對受害者（如戴名世）、事蹟及事件（如莊氏史案）作了較為公正的評介；對受害者的作品亦在多方搜求之後作了著錄，如憂庵集（黃山書社一九九〇年版）是近年來新發現的戴名世作品，但在未刊稿中，蕭穆已經搜羅到，這就更加證實了憂庵集確為戴氏之作。

乙、存留了許多明末史料。跋蔣一个先生徵君劉公伯宗（劉城）事略、跋啓禎記聞錄、跋留都聞見錄等文，對明清之際史實多所考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明清二代許多帶有傳奇色彩的事件，見錄等文，對明建文帝之出亡，徐中山王之死，吳三桂上康熙書，明桂王與吳三桂書，鄂爾泰一向異說紛紜，如明建文帝之出亡，徐中山王之死，吳三桂上康熙書，明桂王與吳三桂書，鄂爾泰與張廷玉，李光地與陳夢雷，楊光先與湯若望，還有甘鳳池……這些事件人物不僅為歷史家所關心，而且為全社會所關心。蕭穆在這些問題上，有的搜尋出原始材料，有的介紹了事件的真相，有的提供了某些可供參考的異聞，有的提出了一己的看法。在楊光先的問題上，蕭穆所見未必是，然其心情卻是可以理解的；他還記了一個故事：清高宗在看到西洋人進貢來自鳴鐘，便立即諭令沿海將帥加強國防，蕭穆記此，且反復贊嘆，充分反映了他的愛國深心。庚子那一年，他在跋臨川桂氏摹刻唐搨孔子廟堂碑拓本一文中，對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的罪行，深為悲憤，他「北望神京，万感交集」，同時又擔心「大內所藏古今珍物，一旦空諸所有」，其憂慮痛惜之情，難以言表。

有許多老學者的傳記，如錢警石（泰吉）、汪梅村（士鐸）、劉融齋（熙載）諸傳，安徽籍女科學家女士王德卿（貞儀）傳，對於研究清代學術史、科技史，均極有價值。這類記述不限於這些傳志中，還有許多存留在序跋中。其中講到了一些學術源流、治學甘苦，還提示了讀書的門徑與方法，對文史研究者更有作用。他所交往的學者遍及南北，還遠及日本漢學家，其中也有當年中外學者學術交往的反映，有許多值得後來借鑑之處。

第四，除上述幾方面外，從文學說，類稿中也有不少佳文。

蕭穆自言，他的「稍知古文之法」是由劉大櫆評選唐宋八家文選及劉氏文集的啓發。看來，蕭穆之文也確與劉氏相近。這可由以下幾點說明：首先，劉大櫆文中有一部份「氣清詞潔」，與歸方相近；而另一部份「氣肆才雄」之作，則非桐城派之所能範圍。蕭穆文章多為考證之作、學術之文，與「桐城派」之以白描傳神、妙在氣韻的文藝散文不同。但所作錢泰吉、汪士鐸、劉熙載諸傳，內容多得自親身相處的經歷，出自性情，感人至深。又如張愛濤先生軼事，細節傳神，巧於烘託，誠如施補華所評：「傳循吏神氣生動。」其記親屬、記師友者，每於平凡處見精神，頗得歸有光散文神韻。其次，劉大櫆文中有一些大膽的言論，近於黃宗義、唐甄，在當時具有啓蒙意義；蕭穆竟為唐甄的潛書專作一跋，稱其「卓識偉論」；蒯光典的刊行亭林餘集也出於蕭穆之手；蕭的書二魚堂文集後，立論與劉的息爭，更是如出一轍。再次，蕭穆文的「氣力醇厚，博辯馳騁」（桐城文學淵源考），也很像劉氏文風，即近於陽剛之美，與歸、方、姚、梅之以陰柔擅長者各有其勝。至於馳騁之中，

一氣而下，洋洋灑灑，因而字句上不暇推敲，間亦有之。此點與劉亦甚相似。

然而，從總體來看，蕭穆文考證精詳，氣力醇厚，旁徵博引，批郤導窾，記事者善於提要，說理者巧於鉤玄。文藝性之外，更為學術文、應用文的寫作，提供了很好的典範，因而它的作用也就不僅限於文藝範圍。

蕭穆論文，最重性情與學問，他說：「文之為道，無真性情、真學問，又安能有真文章耐人尋覽，放其遺聲也哉！」（與李又哲先生書）又說：「夫文章之事，根於性情。」（吳桐雲先生五十壽序）蕭穆的學問淵博，既如前述；他的性情，從上面的敘述中，也可看出：以一介寒士，毅然自任以文獻之重，在一生幾十年間，事親孝，與友忠，不為名，不為利，不好聲色，不肯舞孝，矻矻孳孳，埋頭苦幹，一心以傳播古書、方便讀者為務。從類稿看，其中有許多十分動人的事。例如，他抄書抄兩份，準備以一份供給別人借讀，其為人設想何等周到！又如，他與一些友人同刻一書，在書未刻成而款已用盡時，他竟將自己家藏善本典押出來，得款以充刻費。受典者將其書翻刻，他不僅不加阻止，還為之校勘；不僅不取酬，還每年必自資斧，兼帶禮物，親到各地就藏書家借舊本、秘本相參校。刊成後，猶繼續求書細校，寫成校勘記，又讓別人署名，他所換得的只是把書刻出來。他就是這樣自覺自願地做書史上的無名英雄。至於在家庭方面，在鄉鄰師友方面，蕭穆之尊愛親善，皆稱範，如冒廣生、陳衍、姚永樸之始見蕭穆，時皆不過二、三十歲，蕭穆殷懃指導、誘掖，皆推心置腹。總之，在這三百一十多篇文章中，處處流露出蕭穆的醇樸深厚的性情。他是至性過人的，